



中国历史小丛书

儒学兴衰史

马 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儒学兴衰史

马 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兴衰史/马勇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7

ISBN 7-218-02169-7

I. ①儒…②历…

I. 马…

Ⅱ. 儒家—研究

N. B222.05

儒学兴衰史

马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肇庆市星湖大道)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05,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3,000 册

ISBN 7-218-02169-7/B·51

定价:9.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生于安徽。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另有论文20余篇散见于国内外各种专业刊物上。

引 言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一直对儒学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大陆突然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对孔子及其儒学推崇有加，越来越信服。有一学者在台湾《鹅湖》杂志著文描述说，“在现在的大陆，虽然还未形成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但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已经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认同，如文学中出现了‘寻根热’，音乐中出现了‘西部歌曲’，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等等。也就是说，在当今的大陆，人们已经从民族文化崩溃的极度痛苦与失望中猛醒过来，开始重新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了。这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但其前景不可限量。这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契机，是中国文化命运的否极泰来。中华民族在经过一百年来一直到文化革命的极度痛苦和失望后终于盼来了儒学复兴的可能性和大好时机。”

然而前推 20 余年，中共中央在 1974 年的第一号文件中指出：“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因此中央号召，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只有通过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

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

遥想 20 世纪初年的五四运动，批孔批儒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曾以“只手打孔家店”而著称的“老英雄”吴虞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算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和讲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地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因此吴虞对孔子及儒学极为反感，公开宣称“盗跖的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要想有新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先有新学说，以为中国学界开辟新天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批判孔子和儒学，就需要儒学革命。“儒学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

不到 100 年的时间，儒学的命运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欲明白其中的原因，尚有待于我们从孔子及早期儒学说起。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百家争鸣与儒学的生命活力

一、孔子与早期儒学	(2)
二、百家争鸣与儒学的分化	(9)
三、先秦儒学的终结	(18)

第二章 一家独尊与儒学内在活力的式微

一、政治统一与学术统一	(24)
二、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	(26)
三、儒学的变质与内讧	(30)

第三章 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儒学的重振运动

一、经学的沉沦与儒学玄学化	(42)
二、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53)

第四章 政治鼎盛与儒学再度官学化

- 一、政治统一与三教可一 (64)
- 二、儒学的统一及其地位的提升 (67)
- 三、儒学的困境与更新 (70)

第五章 三教归一与儒学的转型

- 一、三教归一与儒学的转型 (80)
- 二、儒学的复兴与理学的奠基 (80)
- 三、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 (92)
- 四、理学的对立面：事功之学与心学 (101)

第六章 政治高压与儒学的变异

- 一、政治高压与儒学的变异 (110)
- 二、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及其式微过程 (110)
- 三、阳明学：心学之集大成者 (112)
- 四、异端思想的崛起与晚明清流运动 (116)
- 五、补儒与超儒：中西文化的初步接触 (123)

第七章 政治变动与儒家经学的终结

- 一、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 (130)

二、乾嘉汉学的兴起与繁荣	(132)
三、今文经学的崛起与托古改制	(141)
四、儒家经学的终结	(152)

百家争鸣与儒学的生命活力

- 儒是古宗教的教师
- “周因于殷礼”与周公制礼作乐
- 从“皆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私学的演化
-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孔门弟子自立门户
- 百家争鸣与“儒分八派”
- 对孔子思想的超越与发展
- 先秦儒学的终结

说起孔子和儒学,我们不能不从儒的起源说起。就儒,以及儒家、儒学的原初本意来说,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分歧,然而进入 20 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原本还算清楚的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

一、孔子与早期儒学

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由此可见,儒名之起源应远在孔子之前。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这种两极阵营了。

根据胡适的研究,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和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地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事务。显而易见,在胡适的概念中,儒的职业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

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至少在殷代已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也由于他们脱离直接劳动,故而久而久之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

他们的职业相对低贱,收入也相对菲薄。但是由于他们有了相当的闲暇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而正是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发繁琐,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这种变化应该发生在殷代,否则便无法说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何来那么多的凭借资源。

殷周之际的更姓易代,对于儒者阶层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和考验。鉴于他们在殷代的发展和演变,他们虽然还没有真正上升为贵族阶层,但作为已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殷商贵族和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殷商社会,毕竟已为他们留存了相当优越的生存空间。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周代统治者,虽然生机勃勃、新兴向上,但毕竟缺少足够的文化素养,因而时常对这些殷商遗民不够尊重,从根本上瞧不起这些没落贵族阶层。于是在西周建立的最初阶段,包括这些儒者在内的殷代遗民便不时与西周统治者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

作为大势已去的没落贵族,殷代遗民对西周的反抗当然不能成功。到了周公东征胜利后,包括儒者在内的殷代遗民实际上已经被迁出西周统治的政治中心地区,而集中在宋、卫、鲁、齐、燕等地。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些地区何以在后来差不多都成为儒学发生的中心地区。

这些殷商遗民被集中管理之后,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反抗已不可能,但他们一时间也无法认同周人的统治,不时进行一些小规模的骚乱。于是为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周王朝

在全国政权初步巩固以后，又把姬周王族中最为可靠和最有力量的亲属分封到殷代遗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如周公子伯禽封鲁，召公之子封葵，太公望封齐等。这样，殷代遗民被分而治之，反抗的可能性就更小。

周人在推翻殷商，夺取政权，初步恢复了秩序之后，面临一个规范制度、重建秩序的迫切任务。于是在西周初年有周公制礼作乐的事情发生。

制礼作乐是时代的需要，但从西周初年周人的实际文化状况看，单独凭借周人的努力便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西周的统治者想到了那些殷遗民，想到了这些遗民中的儒者。这些儒者出于本能的考虑在最初的阶段容或并没有接受周人的邀请，因为尽管他们并不是殷商的真正贵族，但他们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与殷商贵族的利益相关。然而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些儒者与殷商贵族的微妙关系，他们既不是殷商贵族的当然成员，便没有为殷商王朝殉葬的道理。他们可能出于与在殷代时同样的生存需要，在与西周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终于接受周人的邀请，出而协助周公制礼作乐。于是我们看到周公所制出来的礼乐制度，便带有殷商文化的明显痕迹和模仿特征。这就是《论语》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通过制礼作乐，原本是殷商遗民的儒者基本上都归附了新朝，作了“二臣”，开始了为新主人服务的生涯。而且由于这批儒者毕竟是当时社会各个层面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阶层，因而他们在新朝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他们所信奉和营构的那些理论也理所当然地逐渐成为新朝的

官学。对于西周前期的历史来说,儒的官学化显然有助于周朝政治的发展与和谐,尤其是这些儒者鉴于殷亡的教训而进行的制度兴革,更有助于西周前期的政治稳定。

然而,那种内外安宁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尤其是厉王即位之后,西周政治除了原有的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尚未化解外,且又因厉王本人“好利”以及残暴性格而更加重了西周王朝的政治危机,结果引起国人的集体反抗,厉王被迫出逃。厉王出逃为西周政治的发展赢得了契机。于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经过长达 14 年之久的共和改良,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此即史书中津津乐道的“宣王中兴”。

宣王在位 46 年,继其位者为幽王。幽王之时,西周政治的衰败景象再次呈现,且因内外矛盾的纠缠更严重于往昔。再加上幽王个人生活的极度不检点和用人不当,结果在周边诸侯的攻击下,幽王被杀于骊山。其子继位为平王,平王已无法按照既有的模式照旧统治,于是有平王东迁之举,周朝政治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统观西周政治发展,尤其是它在康王之后不断走下坡路的事实,我们觉得除了历史上的“积久必弊”的惯性运动外,实际上可能与周初政治设计存在相当的关联,当然也与殷遗民中的那些儒者的政治劝告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周初以道德为本位的政治设计,其核心是维护以周太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它所强调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原则,显然都是鉴于殷亡的教训。但是,

这种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政治设计虽然有助于周初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但它毕竟忽略或无视了诸侯国和国人的利益。再加上康王之后诸天子个人素质上的关系,这些矛盾在旧秩序的体制内显然已无法解决。



孔子行教图

与此政治趋势相伴而行的,在思想文化上便是由先前“皆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态向多元化、多极化发展,

统一的官学终于演生成为各个诸侯国服务的“私学”，甚至有以私人身分公开聚徒讲学的现象。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于是便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出现。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至为复杂。他除了向周太史老子问过礼外，主要得之于他所处的鲁国之思想文化传统。我们知道，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就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从而使鲁国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尤其是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遂使鲁国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于是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不仅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而且因此而对周初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以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似乎可以说，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当然，即使相对于孔子一生来说，儒家学派的创建也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它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发生在孔子的早中年，而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形成的复杂过程，也与孔子本人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密切相关。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由此看来，孔子虽然在年轻时代即已确立远大的抱负，但实在说来，他在人生境界的进程中也因挫折而产生

过迷惘和困惑，他的圣人境界之确立似乎只是其晚年生命之所悟，而儒家学派的创建似也应是其晚年的事。

如果相对于后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孔子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皇皇巨著，更没有通过自己的著述活动去建构什么理论体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孔子的思想贡献是通过那些具体入微的只言片语的讨论，通过那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态度进行古代文献的整理，不仅建立起一个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而且为后世儒者对其思想原典的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思维余地。试想，如果孔子真的有系统且条理地著述，真的那样将各种原理、原则都作了详尽而周到的论述，那么儒学的后来发展或许应该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至少不宜创新与不断再生。故而孟子在讨论孔子的思想贡献时，所强调的只是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而不是以直接功利主义作为思维创造活动的唯一目的。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孔子的学说根本就不具有功利的目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孔子毕生甚至包括他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真正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不过，我们需要明了的是，孔子的这种投入与参与，并不是以一己的私利为目的，而是通过政治的参与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这种现实政治的中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至大目的。故而当他面对一连串的挫折时，也情不自禁地叹喟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可谓雄心勃勃。只是到了晚年，孔子知道之不行，遂潜心于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献。关于前者，相传他弟子三千，可谓规模宏大；关于后者，相传儒家经典差不多都经过他的整